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

房建昌

对于近代来华的犹太人和犹太教，我们了解很少，国内外也缺少这方面论著，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和宗教史的空白。实际上，近代来华的西方人中有的就是犹太人，只是一般不加区分罢了。仅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或中苏关系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就有：1922年以苏联全权代表身份来华的越飞；小时在哈尔滨生活过，1923年以代理外交人民委员身份来华，后又出任首位苏联驻华大使的卡拉汗；1923年来华任孙中山先生政治顾问的鲍罗廷；1926年随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上海，1930年再次来华，翌年操纵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扶植了王明的米夫。可以不夸张地说，在苏联当时来华的外交官和顾问中犹太人屡见不鲜。来华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外交官或汉学家中则多为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

以上只是旅居或暂居的犹太人，我们真正要重点介绍的是定居型的犹太人，即在某一时期以中国为主要居处者。他们的来华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部分：1 鸦片战争爆发后来自印度，在华中、华南和香港等地以从事鸦片贸易为主的塞法迪犹太人，先后总数不过数千人，但他们大多为中产阶级，有的暴富。2 上世纪末随着沙俄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而来的俄国犹太人，先后在两万人上下，来时大多一贫如洗，后来有一些跻身中产阶级，大富者不多。3 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纳粹驱逐出来的德奥犹太人，两万多人，纳粹规定随身所带不得超过10马克，大多数居住在日本统治下的上

海。以上三部分在华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多离去，至解放初期已所剩无几。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中，犹太人当时在西方人中所占的人数比例虽不大，但他们凭着自己独特的经商才能，很快积聚了相当数目的财产。而在上海、香港与哈尔滨的经济繁荣和城市建设中，犹太人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犹太人在异国得以维系其民族传统，依靠的是犹太社团和犹太教祈祷所及会堂，他们并主宰了犹太人的婚丧嫁娶和生老病死。这在来华的犹太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鸦片战争后犹太商人得以在上海和香港立足，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富商阶层以后，他们在两地建立了自己的社团，并有了犹太教祈祷所及会堂。从本世纪初至 30、40 年代，俄国犹太人先后在哈尔滨、天津、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大连、奉天、青岛建立了自己的社团，并有了犹太教祈祷所或会堂。而社团与犹太教祈祷所及会堂往往同在一处，是密不可分的一体。特别是在象上海和哈尔滨这样较大的犹太聚居地中，他们有自己的犹太组织和机构，有的还是政治组织，如犹太学校、犹太兄弟会、犹太俱乐部、犹太义勇队、犹太共产党、犹太医院、犹太养老院、犹太救援会、犹太银行，还有各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有的组织实际上是国际犹太组织在华的分支，如先后设于哈尔滨和上海的远东犹太中央情报局。上海、哈尔滨和天津的犹太社团还办有自己的报刊，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团于 1904 年 4 月 22 日创办的英文《犹太月刊》(Israel's Messenger, 直译为“以色列之传讯者”)和哈尔滨犹太社团于 1920 年创办的俄文《犹太生活》周刊。通过这些组织和报刊，在华犹太人同欧美和印度的犹太组织和报刊保持着密切联系。

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时，中国境内有犹太人约 1.5 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已形成社团的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包括附近的满洲里)、奉天、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和香港，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一些城镇，有少量未结成社团的犹太人。上述犹太人中以俄系占绝大多数，多与哈尔滨有渊源关系，称作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即

中欧和东欧系犹太人;少量为居住在上海的出自中东的犹太财阀及归于其工作系统的犹太人,他们多持英国国籍,称作塞法迪犹太人,即英印系犹太人。

日占时期,这些犹太人的居住地在日本侵华军政机构及满铁的控制之下。本文主要利用至今鲜有人使用的当时日本侵华军政机构特别是满铁的秘密文献,辅之以其他有关日文调查资料,勾勒居住在中国各地的犹太人数目、社团、经济状况及文化教育设施等方面的概貌。限于篇幅,日本侵华军政机构及满铁对犹太人的政策和调查情况将另撰专文予以探讨。

另外,自鸦片战争后,印度及西方的犹太人就在香港经商,不久建立了犹太社团和教会堂,有一任香港总督是犹太人,他还是犹太教会堂的理事。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叙述大陆的犹太人。

一、哈尔滨及附近城市

哈尔滨:上世纪末,随着沙俄在东北北部修建铁路,在俄国饱受压迫的犹太人逐渐来到此地,较早的是铁路技师尤科维奇等,而后犹太人数逐渐增多。哈尔滨 1910 年有犹太人约 1500 人,据 1916 年的统计,哈尔滨有犹太人 5032 人,其中男 2628 人,女 2404 人;1919 年哈尔滨有约 7500 犹太人。据《犹太生活》30 年代后期的统计,哈尔滨犹太人会结成的犹太人数为约 1.2 万人,1930 年有约 1.3 万人。伪满洲国成立后,由于日本操纵的哈尔滨俄系法西斯等组织的破坏及经济形势的恶化,哈尔滨的犹太人逐渐向上海、天津等地迁徙,人口大减。据 1940 年前日本人的资料统计,哈尔滨当时仅有犹太人约 2800 人。

1903 年,哈尔滨犹太社团已形成。同年,犹太教会堂举行了落成典礼,有会众 500 多。1912 年,27 岁的俄国犹太医生考夫曼来到哈尔滨,1919 年后,他成为哈尔滨及整个中国俄系犹太社团的领袖,直到 1945 年 8 月他被攻入的苏军押解回苏联。

1920年,哈尔滨犹太人会由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40名理事构成的理事会行使职权,正统犹太复国主义党占13个席位,非犹太复国主义派的崩德占12席,进步党占2席,锡安工人党、Zeire Zion(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精神中心党、以色列正教党和Volsparti各占1席。

中东铁路当局首脑对犹太人较为照顾,让其中的一部分承包了铁路的修建及有关供应事宜,他们中有的因而迅速致富。少数犹太人在初期为了尽快地攫取财富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仅走私,而且贩毒和开设妓院。犹太人在俄国曾多次遭到大规模的虐杀,十月革命后,不少白俄妇女逃至哈尔滨,生活无着,而已立足的少数犹太人一方面要利用她们赚钱,另一方面是出于阴暗的报复心理,让其卖淫,使她们成为当时哈尔滨色情业的主力。而对逃来的犹太妇女却予以救助,决不允许她们从事贱业,破坏犹太人的名声。少数犹太人因从事鸦片、酒类等边境走私而暴富。上述暴富的犹太人尽管在东北犹太人中声誉不佳,但他们为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和满洲里犹太社团、犹太教设施及文化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使东北的犹太社会得以较快地发展。

不过,大多数犹太人是靠本民族传统的商业经营而进入小康的。1899年,贝尔采耳在哈尔滨埠头区开了家小商店,是为哈尔滨犹太商业发展之始;接着,他与一个叫巴茨哈的犹太人合开了家食品杂货店,同时开了几家停车场兼饭馆。卡甘在哈尔滨旧市街的铁路总局处开了肉铺,多维尔津亦从事此业。尔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扩展到当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到1908年,东北北部有犹太约6000,资本额达3000多万卢布。

犹太人以善经营金融业闻名。在本文所述时期,哈尔滨主要有

满铁调查部:《在哈犹太人及犹太人系统机关ノ最近事情》(犹太问题调查资料第17辑,1939年10月)。

哈尔滨铁路局北满经济调查所编:《北满ニ於ケル犹太资本ニ就テ》(1937年3月)。

两家犹太银行。1922年1月,哈尔滨远东犹太商业银行(通称远东犹太人银行)开设,报称有资金400万元,实缴10万元,主要以犹太工商业者的资金融通为目的。第1年决算统计:295.8万元为票据贴现,流动资金余额9855.79万元,盈利4955万元。1923年6月3日,哈尔滨犹太人会主办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营业。

经济上稳定之后,犹太社团开始致力于本民族的慈善事业,据1935年前后日本人的实地调查,哈尔滨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民族特质(据说有不让犹太人乞食的不成文法律),已开办了多项自己的济贫事业。有关社会事业团体如下表:

名称	开设时间	主要活动	收容救济人数
犹太养老院	不详	收养老人	24人
犹太妇女慈善会	1907年	向贫困妇孺提供生活费、房租、冬季燃料、衣物	190户
犹太免费食堂	1907年	提供贫困者免费或半费午餐	
犹太人贫民救济会	不详	不问国籍为贫困者施诊	2.58万人(年)

1915年,俄国犹太人掀起了东迁潮,目的地主要是美国,哈尔滨成了所经要路之一。1917年10月时,除了在当地定居的犹太人之外,这里还滞留着两千多犹太难民,其中许多人在此遭到欺诈、偷窃和毒贩的敲榨,衣食无着,居住环境恶劣。美国的“希伯莱庇护和移民帮助协会”(The Hebrew Sheltering and Immigrant Aid Society, 缩写为HIAS)决定派马森(Samuel Mason)去远东帮助这些难民。次年,该协会下属的远东犹太中央情报局(Far Eastern Jewish Central Information Bureau)在哈尔滨正式设立,负责人被称作主事,是从外面派来的比尔曼。尔后,这一犹太移民救助组织一直以哈尔滨为主要办公地。1918-1936年间,远东犹太中央情报局在海参崴和伊尔库茨克也设了类似的机构。这16年间,该局处理了68566件移民申请、公民证书认证和世界范围内的找寻

亲友,仅申请移民的就超过了1.6万件,为这些人准备了15384份文件,过万人是被送往国外的,有417位亲属从东欧被送往远东的家中;千万个食品包裹被寄往东欧和俄国亲属手中;每个申请资助者得到了134-468美元;有29528个寻找者被送往失散亲属处,有16246件成功。在此期间,又有一些德奥战俘或捷克军团中的犹太人在回国时也得到了该组织的救济。由于该局的情报之名,往往被外人,特别是1931年后占领东北的日本侵略者误认为是情报间谍机构,而实际上该局仅处理难民所需要的信息情报。

1907年,埠头区犹太小学校开设。1909年,犹太居民小学校开学。1935年,犹太第一小学校开办。据1923年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报告:当时哈尔滨建有犹太中学、犹太人音乐及文学会、犹太人图书馆。1937年的资料记载:犹太人图书馆属新寺院管辖。本世纪上半叶,哈尔滨是整个东北唯一出版犹太报刊的地方,由于哈尔滨的犹太人主要来自俄国,所以这些报刊除了极少数是采用希伯莱文印行的意第绪语外,其余均为俄文。

1919年10月,《哈尔滨犹太人理事会会报》(

)首次印行,24页,发送会员。后该会报不定期印行。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刊物是《犹太生活》。1920年12月,驻上海的巴勒斯坦情报局随同主办了仅两个月的周刊《西伯利亚-巴勒斯坦》()迁往哈尔滨,该刊旨在阐明有关远东的移民、商业机会和涉及巴勒斯坦的一般情况。考夫曼受邀去办该刊,他易名为《犹太生活》,26-30页,发行量后来达500份,带插图。该周刊尔后一直由考夫曼维持到1942年底,一度十分有影响,名义上是哈尔滨犹太人会的机关刊,不过考夫曼一直是该会的会长,故实际上代表了考夫曼的正统犹太复国主义观点。该刊

见桑德斯(Ronald Sanders)著《难民的支柱》(*Shores of Refuge, a Hundred Years of Jewish Emigration*),纽约,1988年,第303-305页。另见满铁调查部编《哈尔滨ニ於ケル犹太势力》(犹太问题调查资料第16辑,1939年9月)。

风格端正、中允,注意报道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消息,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也注意报道远东其他地区犹太社团的消息。对于哈尔滨及中国东北犹太人史的研究,该刊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在1910-1922年间,哈尔滨曾经出版了《“意马尔达格”希伯莱音乐、文学和戏剧协会报告》(“ ”

),每期报告23页,另附14页广告。是MALDAG的转写,源于“意第绪语言、音乐、文学和戏剧协会”德文名称Idische,Musikalische,Literarische und Dramatische Gesellschaft首字的缩写。该协会有助于促进哈尔滨犹太社团的文化,较有影响。

1918年1月,上面提及的考夫曼在哈尔滨编印了首期《犹太之声》()月刊,这是为同年召开的全俄犹太会议地区委员会准备的,以后再未出版。1918-1919年间,上述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Zeire Zion印行了短命的油印月刊《土地与劳工》()。

1919年,哈尔滨属犹太复国主义派的锡安工人党出版了自己的党刊(),仅8页,但我们未发现第2期以后的,应该是停刊了。1921年7月,由萨布兴(N. Sabshin)编辑的该党党刊《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创刊,每期20-25页,但只发行了四五期即于同年停刊。

1929年5月,哈尔滨犹太妇女俱乐部()开始出版自己的报告,1931年4月停刊。

1932年,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协会和满华特鲁姆佩尔道队(Brith Trümpeldor)主办的《旗帜》()半月刊在哈尔滨创刊,40页,印行300-500份,编辑为该派的首领古尔维齐(. .

),除了报告该派及本地社团的活动,重点在人口和移民问题,特别是返回巴勒斯坦问题,也发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情况。该刊在哈尔滨较受欢迎。

在伪满建国前,哈尔滨有一份存在了15年的俄文日报《生活

新闻》()，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特色，发行量 2000-3000 份，在犹太社会中被广泛阅读，虽非专门的犹太报纸，但不时强调犹太社会主义的意义，反映出了当地和国外犹太社会和政治形势的完整画面。

海拉尔、满洲里及齐齐哈尔：1939 年，齐齐哈尔社团公布该社团由 30 名犹太人组成。据满铁 1940 年公布的调查，海拉尔(含满洲里)有约犹太人 130 人，齐齐哈尔有约 50 人，但在“九一八”事变前，人数至少多两三倍。抗战胜利后，三地犹太人纷纷向哈尔滨及中国其他较安定的城市迁徙，随之而来的东北解放战争加剧了这一趋势，至以上三地解放，犹太人已所剩无几。

三地的犹太社团祈祷所分别开设于 1910、1912 及 1918 年，而这也是社团的成立年。祈祷所均设于社团内。日本占领东北后，由于满洲里地处边境，而日本与苏联处于交战状态，满洲里的犹太人纷纷向海拉尔或哈尔滨等城市迁徙，人口急剧减少，社团也停止了活动，遂出售社团房产，留下的不多的人在社团活动方面附属于海拉尔社团。1935 年度海拉尔的犹太宗教公会收支预算为 12778 戈比，得到了上属的海拉尔犹太协会总会的批准。1938 年 5 月 28 日该总会召开会议，选举 I V. 瓦尔夏维斯基为会长，M. A. 埃维谢维奇为副会长。该协会当时下设宗教部、文化教育部、慈善部、米希哈茨托噶波利姆部(救济机构)、别布洛·卡德伊休部(殡葬机构)等。1939 年 12 月，70 岁的商人亚伯拉姆·雅科夫列维奇·斯托利加茨克(无国籍)作为海拉尔-齐齐哈尔的代表参加了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议员。哈尔滨犹太社团领袖之一的济明在会上代为宣读了齐齐哈尔犹太社团业务报告，报告称该社团宗教活动兴旺，并就帮助难民及募集民族基金(即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费)问题作了宣传，但还很不够。

据日本专门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国际政经学会发行的刊物《国际秘密力の研究》第 5 册，东京，1938 年，第 334 页。

以上三地犹太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其中与当地有关的牧产品贸易居多,也有从事林业采伐的,经济情况属中等。日本占领东北后,当地犹太人的经济状况与当地其他百姓一样显著恶化。抗战胜利前夕,日寇对海拉尔的主要犹太领袖以间谍嫌疑进行了屠杀。

据伪满洲国文教部学务司 1934 年的调查,海拉尔犹太学校 1929 年前从东北教育厅每年接受补助 700 元,尔后不再补助;私立学校有满洲里犹太学校,经营者为犹太侨民会,为四年制日校,有四个年级,当时有学生 80 名,教职工 5 名,入学资格不限,学费每月有哈洋 2 元及 5 元两种。同调查称该学校 1929 年以前每年从东北教育厅接受补助额 600 元,尔后不再补助。

二、大连及奉天

大连:最早进入大连的犹太人主要是沙俄时期随俄国军队而来的犹太军人。随着哈尔滨犹太人的增多,有些俄系犹太人为了寻找出路而来大连谋生,另外还有因逃避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新政府而来的。

历史上大连犹太人数一直缺乏统计,据满铁 1940 年的调查约为 170 人,而上一年底大连犹太社团领袖自己公布的数字为 190 人,更准确的是 1940 年 10 月日本在华殖民机构关东州外事厅警察课的统计,该课根据“关东州”(即当时被日侵占的我国辽东半岛)内居住犹太人的不同国籍分别统计(见下表)。

1937 年以前,大连犹太人可能一度会有超过此数的时期,后因日本对经济的严密控制而被迫离去至上海等地。1937 年后,犹太人离开大连的很少,一方面是在日本的控制下他们迁徙很困难,

见维勒《满洲与莫斯科人》(B. L. Putnam Weale, *Manchu and Muscovite*), 伦敦, 1907 年。

满铁:《在满犹太人 / 经济的过去及现在》(1940 年 12 月), 第 20 页。

	无国籍	苏联	德国	瑞士	拉脱维亚	波兰	立陶宛	捷克	美国	匈牙利	计
男	79	31	3	1	2	4	13	1	1	2	137
女	64	35	2	1	1	8	7	2	1	1	122
计	143	66	5	2	3	12	20	3	2	3	259

另一方面是上海遍布欧洲犹太难民, 他们不会去凑热闹; 相反, 1938- 1939 年间, 不少中欧犹太难民因在上海谋生不易, 未经允许乘船来到大连, 要求获得伪满护照, 他们的目的地并非只是大连, 而是要在伪满谋生。这给大连的日伪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而在这背后当然有他们已在中国东北立足多年的同胞的怂恿和支持。1940 年以后的数字是逐渐减少的, 因为日本投降后, 大连的犹太人多下决心离华, 除一小部分回了苏联, 大多后来去了西方, 也有定居以色列的, 至 50 年代初已所剩无几。

大连犹太社团一直与哈尔滨的犹太社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0 年代初, 大连建立了犹太人会。此后, 由于犹太会员的增加, 事务日趋复杂, 同时为了适应犹太教会的建设和图书馆的扩大, 大连犹太人会决定开设犹太人会馆, 从伊町(今世纪街《大连日报》社一带)32 番地借到了房子, 进行了大的改造, 于 1935 年 8 月从山县通(解放后叫斯大林街, 1995 年改称人民路)181 番地(原犹太社团所在地)迁入。

会馆有教会(即祈祷室)、图书馆、事务室, 并有大厅, 主要用于开全体大会、讲演、大型讨论、开音乐会及夜间娱乐会、演戏和会员社交。至 1940 年 4 月, 图书馆已藏书 4243 册。1938 年会员 A. M. 修里曼去世, 遗孀将柳町(今南山路)61 番地的房屋(地价时值 1.2 万余元)捐赠给了犹太协会, 作为基本财产。维持协会的资金有以

驻日本美国随军布道师迪克尔拉比著:《在远东的流移者与定居者, 犹太人在中日一世纪的生活》(Heman Dicker, *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 纽约, 1962 年, 第 53 页。

下来源: 1. 会费, 2 图书馆经营及慈善晚会收入, 3 宗教捐赠。

1937 年, 大连派代表参加了为期 3 天的第 1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 这在大连犹太人史上是一件大事, 因为它促成了大连犹太社团的真正建立。此前, 大连的犹太人虽已近 200 人, 但犹太人会有名无实, 这不利于他们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在东北犹太社会中的协调行动。在这次大会上, 成立了远东犹太社团中央协议会这样的常设机构(设在哈尔滨), 除了上海非俄系犹太人及香港的犹太人未派代表参加外, 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齐齐哈尔、海拉尔均有代表被选进协议会理事会任理事, 这就确立了哈尔滨犹太社团的领导地位, 使大连这样的小社团有了统一的领导。此后大连的犹太人在哈尔滨犹太中央机构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之成为来自上海的中欧犹太难民进入伪满的入口; 另一方面, 大连犹太社团的真正建立为他们自己在犹太经济机构中的谋职、贷款及婚姻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1938 年 10 月, 大连犹太人社团在会长 E. L. 考涅尔及秘书长 L. E. 利别尔曼的主持下召开全会, V. I 列列奇茨卡娅夫人作了报告。在听取了协会委员会和监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全会进行了改选。同年 12 月底, 大连犹太社团委员 L. M. 罗果维因参加了第 2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 并当选为日本及“关东州”代表。

1939 年 12 月, 57 岁的所罗门·马茨埃维奇·古罗伊斯曼和 56 岁的埃菲姆·利乌奥维奇·考涅尔两名无国籍商人作为大连的代表参加了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 并均当选为代议员。考涅尔还当选为大会副议长, 在会上宣读了大连犹太社团业务报告。报告称这年夏天, 由 Y. I 比尔布莱耶尔在大连发起建立了犹太难民儿童村, 收容了上海贫穷难民儿童(即从德奥及波兰逃至上海)男 34 人、女 16 人达两个月。经费由哈尔滨市犹太社团出

《国际秘密力の研究》第 6 册(1940 年), 第 123 页。
据 1939 年 1 月 6 日《犹太生活》。

3600 元, 大连犹太社团出 2400 元, 齐克曼(Lew G. Zikman, 住在哈尔滨的波兰犹太糖王)出 6500 元。儿童的健康得以恢复, 成果显著。报告强调了社团宗教部的活动, 其中包括整理旅顺俄军墓地内的犹太士兵墓。文化事业兴盛, 图书馆藏书 2000 多册, 还举行了各种祭仪及发表报告演说。设立了民族思想部, 从事犹太问题研究。慈善与难民部也很活跃。

大连犹太人大多经商, 有的因此致富。部分大连犹太商业机构实际上是哈尔滨犹太商人在大连开设的分号。伪满以前, 在大连的外商中, 犹太商人尚未入一流; 伪满时期是日商的天下, 犹太商更遭抑制。大连的犹太商业机构主要有以下几家:

罗果维因是十月革命后随白俄出逃至哈尔滨的, 当时身无分文, 但他持有药剂师证书, 遂靠与苏联的关系, 取得了苏联药剂的经营权, 因而致富, 后来也卖德国和日本药剂。哈尔滨及大连有他的“达里托塔特”药剂店, 他本人常住大连。在大连的店 1939 年资本 9 万元, 营业额 25 万元, 盈利 1.9 万元。在哈尔滨的叫莫斯科药局, 资本 3 万元, 当时年营业额 17 万元, 盈利 3 万元, 店员 4 名。

英国犹太实业家布朗耐尔(Frank Brunner)和门德(Ludwig Mond)合办的卜内门(Brunner Mond)公司是家全球性的以经营碱制品为主的大商号, 在大连及哈尔滨开有大化学品店, 在各地有华人代销商, 专职店员 30 名, 资本 30 万元, 1939 年营业额 300 万元, 盈利 35 万元。

考涅尔 1919 年从西伯利亚逃来, 先在哈尔滨, 后又在大连经营卡姆奇亚茨卡皮毛商号, 在两地开有皮毛商店, 在大连的店资本

关于大连犹太人的资料极少, 最珍贵的当属 1940 年 10 月关东州外事厅警察课所编 16 开打印本《在连白系露人概况(犹太人ヲ含ム)》, 其中大连犹太人协会一章, 分概况和大连协会两部分, 后一部分又分设立的动机、沿革及活动状况、维持方法、组织四节; 另有 27 页的犹太人协会加入者名簿, 按户开列了 200 余名犹太人的住址、职业、家庭关系、姓名、出生及来到大连的日期; 后附男女人数及国籍情况表, 十分详细。另见满铁调查部《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犹太问题调查资料第 22 辑, 1940 年 2 月), 第 6、12、37 页。

10 万元, 1939 年营业额 30 万元, 盈利 8 万元, 店员 10 名。斯维托居住大连, 从事贷款业, 一度任总行在哈尔滨的协和银行大连分行行长, 资本 6 万元, 1939 年营业额 3 万元, 盈利 1 万元。

布列茨斯列尔最初与华人一起在大连开办点心工场, 后又在大连同开维克多利咖啡馆,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遂在哈尔滨开点心工场, 在奉天开咖啡屋, 在华北大城市开有分店。他在大连继续过着朴素的生活, 十分勤劳, 因而获得华人资本家的信任, 得到资金的援助, 可以说是与华人共同致富的。他有房屋两处(大连和哈尔滨), 价值 11 万元; 资本有 50 万元的商品和 20 万元的现金及设备, 1939 年就盈利 20 多万元。他还兼营餐馆。

希埃尔, 又名德夫罗兰斯, 1914 年因逃避兵役从奥德萨来, 在大连及哈尔滨开有运输社, 在大连的运输社 30 年代末资本 10 万元, 年营业额 13 万元, 盈利 3 万元, 雇员 6 名。

法国犹太大财阀“路易·多列依菲斯”集团 1939 年时驻伪满代表吉利别尔斯坦因(犹太人)住在大连, 从事特产输出。在满铁沿线也开有分店。在伪满有流动资本 400 万元, 1939 年在伪满营业额 950 万元, 盈利 27 万元。

德国犹太人霍尔斯坦(C. Holstein) 1912 年在汉堡开了自己的公司, 自任总经理, 1924 年在大连开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分公司, 经理为尼施(G. Nisch), 经营进出口和船舶代理, 主要输入德国钢材、机械、染料、药品及杂货等。该分公司 1926 年经大连港输入货物 3.3 万吨, 1927 年 5.62 万吨, 1928 年 4.76 万吨, 1929 年截止 10 月 4.84 万吨, 上述输入品有六成为钢材。输出主要为大豆等农产品, 1926 年 2.96 万吨, 1927 年 3.43 万吨, 1928 年 26.9 万吨, 1929 年截止 10 月 28.1 万吨。当时除了尼施经理(薪水 400 元), 公司员工只有 1 名日本人(薪水 200 元)和 5 名华人(薪水 70 - 200 元)。该分公司月经营费用 3000 元左右。

满铁:《大连に於ける主要外商と其业态》, 1930 年印行, 第 87- 89 页。

纺织品商埃菲尔姆·卡扎奇科夫以前为“巴尔伊科夫及古里果利耶夫”商会的经理,后独立经营纺织品销售业,在哈尔滨及大连开有分店,1940年时已将手伸向天津,其资本5万元,年营业额30万元,盈利1.5万元,店员9名。

上述犹太商业机构的主要雇员为犹太人。

奉天:最早来此的主要是在东北北部生活过一段时期的俄国犹太人,主要职业是经商,也有一部分是俄国军人。据当地犹太社团1939年底的公布,该社团有约80名犹太人;满铁1940年公布的调查,有约百人。主要为俄系犹太人。抗战胜利后,当地犹太人纷纷向中国其他较安定的城市迁徙,随之而来的东北解放战争加剧了这一趋势,至奉天解放,犹太人已所剩无几。

民国初年奉天犹太人即形成社团,1938年第2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的召开,促成了奉天犹太社团组织的正式形成。同年,该社团以奉天犹太人会事务所的名义召开了年度总会,会长A.雅诺维奇作了上年度报告,会议通过了1937年度报告及1938年的预算,选举雅诺维奇为会长,N.埃利亚德伊茨基为副会长,纳哈姆·伊萨科维奇·科利亚德伊茨基为宗教事务委员长。1939年12月,科利亚德伊茨基作为奉天的代表参加了第3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代议员。他在会上宣读了奉天犹太社团业务报告,报告称该社团月预算为350元,主要从事宗教及社会方面的活动,在救济贫民、帮助难民就业及募集民族基金方面做了工作。为天津水灾义捐700元,为日本伤病兵捐款769元。社团位于俄国人居住区,祈祷所设在社团内。当地犹太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开店铺或在店铺从业者居多,经济情况属中等。日本占领东北后,奉天犹太人的经济状况与当地其他百姓一样显著恶化。1939

《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第13、41页。

《在满犹太人ノ经济的过去及现在》,第20页。

《国际秘密力の研究》第6册,第334-345页。

年时, 社团内的图书馆室藏书 3850 册。

三、天 津

早在 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就有犹太人开始落户天津, 从事商业活动。但相当一段时期中, 在天津居住的犹太人极少, 大部分为房主及外国商社的代理人, 后来偶尔在天津居住的是皮毛商人。1900 年俄军侵入天津, 其中有部分犹太人。同年俄租界在天津划定, 使俄国人较多地涌入, 其中也有部分犹太人。十月革命后, 大量的俄国人来到中国, 其中落脚天津的也有犹太人。犹太人大量迁至天津, 始于其从东北大批向中原迁徙, 这是日本占领东北后所造成的。在日本占领东北后的 10 年间, 由于哈尔滨经济的衰落, 导致那里的 2000 名犹太人迁至天津, 所以造成了天津犹太人大多来自哈尔滨的现象。天津犹太人口最多时约为 2500 人左右。1937 年时, 天津有犹太人约 600 户, 1600 人, 由于大多数犹太人住在英法租界内, 在 1941 年前, 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天津的犹太社团开始衰落, 部分犹太人逃往上海。抗战胜利后的内战使天津犹太人口进一步减少, 犹太人纷纷离去。天津解放后不久, 天津有 800 名犹太人获准离去, 他们最初担心会被滞留, 但实际情况是当局慷慨地让他们带走了大多数个人财产, 其中有一部分移居以色列。至 1953 年, 天津犹太人已所剩无几, 且多为老人。至 1958 年 6 月 30 日, 天津只剩下 32 名犹太人。天津的犹太人随当地的其他外籍人于本世纪 60 年代初全部迁离中国。

直到 1904 年, 犹太人才开始在天津购置土地营造犹太聚居地, 并于 1911 年正式建立犹太社团, 名为天津犹太人会。社团的绝大多数为来自俄国的犹太人, 少数来自波兰和德国, 因此, 该社团在成立时作为俄国侨民团体, 在当时的俄驻天津领事馆办理了登记注册手续。该社团后来的英文名称为 Tientsin Hebrew Association。

tion (天津希伯莱协会), 1930 年前, 该协会由一委员会主持, 领头的为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格尔谢维奇 (Leo Gershevich)。十月革命后, 天津犹太人社团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并成为当地犹太人最高自治机关, 不论为何国籍, 均可加入。该会作为当地全体犹太人的代表, 为了犹太人的利益与官方交涉, 并以宗教、文化、教育、社会设施及慈善等事业的发展为活动目的。该会要维持教会及医院, 登录出生、结婚及死亡, 给予各种证明, 给予犹太人小学校、慈善团体及犹太人青年团等补助。该会年预算总额超过了 25 万元。尔后哈尔滨犹太人的到来, 大大增强了天津犹太社团的势力。1937 年时, 天津犹太社团有成年男女成员约 600 人, 他们与天津的中外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下辖 10 个团体, 年经费达 12 万元, 来自成员社团费及各种文娱活动等的收入。日占时期, 天津犹太社团受到了日伪政府的控制。

天津犹太社团派代表参加了第 1 至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第 3 届大会选出了代议员 13 名, 天津的代表有 3 人当选: 达维多·埃夫列莫维奇·哈宾斯基, 48 岁, 无国籍, 皮毛商; 尤达·莫依塞维奇·贝奈尔, 55 岁, 无国籍, 商人; 乔伊·莫里斯, 48 岁, 美国国籍, 商人。提交大会的《天津社团业务报告(概要)》称天津犹太居民总数为 1800 人, 内 800 人为白俄, 系无国籍者; 多数团体有独立的预算, 其中社团及教会堂年预算 45 万元, 医院(含诊所)25 万元, 犹太小学校 1.7 万元, 犹太俱乐部 5 万元, 慈善协会 2 万元, 无息金融会 2 万元。由于这时天津犹太社团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故医院药品、器械充足, 开设了手工业学校。对欧洲来的避难者及天津水灾的受害者予以了极大的救助, 救济委员会总支出额达 26692 元, 其中 9930 元为各团体及同人贷出。到 1944 年, 天津犹太人几乎全为俄系, 是个非常紧密的社团, 领袖别洛卡曼

《在远东的流移者与定居者》, 第 43 页。关于天津犹太人情况, 可参见 Brian Power 所著自传《天津》(The Ford of Heaven), 伦敦, 1984 年。

(Zelig Belokamen)是个高大结实的西伯利亚人。1958年天津希伯莱协会正式关闭。格尔谢维奇负责社团事务之始,就在社团内建了一个象样的犹太教祈祷所。1937年,天津犹太社团着手新建犹太教会堂,不久已筹集资金达26万元。1939年建成,为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后由天津著名犹太拉比莱文主持。1948年,当以色列国成立的消息传至天津后,天津的犹太人在会堂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1929年以前,天津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大多集中在盈利较高的皮毛生意上,他们在东北购得皮毛后在天津加工制作,然后远销欧洲和美国市场。据统计,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天津犹太商号达100余家。1929年出现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使天津的皮毛行业遭受沉重的打击,不少犹太商号纷纷转营其他生意,以减轻损失。天津犹太无息金融会(古米尔克·黑塞得)创设于1930年,对本地犹太小工商业者及工薪阶层缺款者给予小额无息贷款,年金融量超过了1.5万元。天津犹太社团不同于在上海和哈尔滨的犹太人社团,其迁来的成员大多数属于犹太贫困阶层。为了帮助这些犹太人谋生,天津希伯莱协会在一开始便把工作重点放在向他们发放无息贷款上。

格尔谢维奇负责社团事务后不久,便搜集到足够的书籍,办成了天津最好的一个私人图书馆。不久,又有了一家俱乐部。犹太人慈善协会创设于1911年,向当地犹太人中贫困者提供现金、食物、衣服、住房及医疗费等,有照顾孤老残疾的救济设施,对初到天津的贫困犹太人给予旅费及帮助联系就业。犹太人慈善协会年预算不到1.5万元。犹太人医院1937年开设,在有空位的情况下,不限其他民族,年经费1.8万元。

天津犹太人学校1925年10月建立,为天津和华北其他地区

《在远东的流移者与定居者》,第148-150页。

见徐新等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天津犹太人”一条。

犹太子女提供了就读机会。据《犹太大百科全书》说,该校用英语授课,教学大纲除包括各种犹太文化课程外,还开设各种基础学科,以保证在该校就读的学生毕业后能在欧洲和美国大学继续深造。而据日本人 1942 年调查华北教育时的报表,该校系天津犹太协会创办,当时在校生 132 人,全为犹太人。1936 年无人毕业,1937 年毕业 7 人,1938 年无人毕业,1939 年毕业 9 人,1940 年毕业 7 人。学校设初等科、中等科及高等科,还附设幼稚园,均由校董会管理。教育方针是授以普通教育,不言政治。三年制,前期学费 30-60 元。教授科目有犹太史、犹太文学、俄语、英语、地理、博物、图画、算术、代数、几何、物理、手工、音乐、体操、打字。使用英国出版的希伯来语、俄语及英语教科书,教学用英俄及希伯来语。年经费 4.2 万元,支出数同。无基金。

犹太人俱乐部(空斯特)创设于 1928 年,为天津犹太人休憩与文化启蒙的社交机构。俱乐部附属的图书馆约有 5000 部希伯来文、俄文、英文藏书,除有可容 500 人的剧场外,还有餐厅、台球室、象棋室等。1937 年时俱乐部有会员约 600 人。俱乐部常举行戏剧、讲演、音乐会及舞蹈表演、舞会等。1937 年俱乐部新的建筑落成,购地及建筑费共约 11 万元,俱乐部年预算估计 4 万元以上。该俱乐部又称“犹太公会”。抗战胜利后不久,由于天津犹太人对苏联的依靠,该俱乐部转属苏联公民协会。

天津的复国主义团体有“阿尔该梅恩复国主义团”(一般复国主义派)、“新复国主义团”(复国主义清算派)、“犹太妇女复国主义团”、“约瑟夫·特鲁姆佩道尔犹太青年同盟(贝塔尔)”等,他们为重返巴勒斯坦,复兴犹太精神,普及希伯来文学,筹集复国主义运动资金等积极宣传和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犹太百科全书》“天津犹太人”一条。

《华北ニ於ケル教育宗教ノ现况 其ノ一(天津特别市教育宗教ノ现况)》,第 54、57 页。

《国际秘密力の研究》第 6 册所收《最近十年間の在天津犹太人の发展》一文。

四 青 岛

最早来到青岛的犹太人是随着上世纪末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的到来而入居的，所以他们多为德国籍，身份主要是商人、银行职员、外交官等，但基本上属改宗的基督徒。十月革命后，随着白俄的大批逃入中国，有不少来到青岛，内有百余名俄系犹太人，后来他们就在青岛定居下来。加上后来接纳的 21 名德国犹太难民，1939 年时，青岛犹太社团由 221 名犹太人组成。抗战胜利后，非俄籍犹太人纷纷去了欧美，据 1946 年 6 月青岛市政府的统计，这时只有犹太人 37 户，141 人。而且其中有的已去了上海，以便在那里的犹太救助机构帮助下尽快出境；而俄系犹太人一直到解放前后才离华，至 50 年代初，青岛的犹太人已所剩无几。

20 年代初，随着犹太人在青岛生活的稳定，他们开始建立起青岛犹太人会，主要是联谊青岛的犹太人，互相帮助（特别是经济方面），发展当地的犹太文化，进行宗教活动。由于青岛的犹太人以俄系占绝大多数，他们在入居青岛前多在哈尔滨生活过一段时间，且与哈尔滨保持着经济和亲属上的联系，而哈尔滨又是中国北方犹太人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所以青岛的犹太人会一直是接受哈尔滨犹太社团领导的。

青岛犹太社团派代表参加了第 1 至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1939 年，39 岁的医生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托瓦宾斯基（无国籍）作为青岛的代表参加了第 3 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代议员。他在会上宣读了青岛犹太社团业务报告，报告称该社团已经过了创建时期，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还开设了犹太会馆，并建有教会堂、俱乐部、拉比住宅等。募集建设费 3.7 万元，内 2 万元为莫休维奇所捐。社团接收的犹太难民（主要来自德

中国市政协会青岛分会：《青岛指南》（1947 年），第 7 页。

国)得到了安排,生活安定。募捐有:难民救济金 1230 元,天津水灾救济金 1250 元,无息金融会有基金 1340 元,以便对需要者予以救济。社团月预算 310 元。欲致力于文化事业,但书籍缺少,故希望其他大社团予以寄赠。托瓦宾斯基时任青岛犹太人会副会长,会长是美籍犹太人 G E 蔡伯尔曼,他是位拥有百万不动产的老人,但实权在托瓦宾斯基手中。

这时青岛 221 名犹太人中无国籍的 173 人(主要为俄系),德国籍 24 人,英国籍 12 人,美国籍 7 人,其他 5 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开有舞池乐队,可以跳舞的饮食店较多,有 6 家,因为青岛为开放港口,有英美等国船上人员及来避暑的洋人和中国阔佬的生意,据说盈利较高。经营贷款业、开理发店、医院诊疗所、事务所的各 2 家,开西服店及乐器店各 1 家;其余独立生活的大多靠薪水。

五、上 海

199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培吉主编《上海犹太人》一书,对上海犹太人的情况有较全面的描述,西方这方面的论述则更多些,因此,笔者拟主要依据过去使用较少的日文资料作些补充。

1845 年,沙逊家族开始在上海经商,随着商业上的成功,形成了居住在上海的出自其羽翼下的几个犹太财阀家族及归于其工作系统的犹太人。他们多持英国籍,在文化及经济上已与上海的法租界及公共租界连为一体,属塞法迪犹太人,最多时有约 700 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上海俄系犹太社团人数达约 4000 人,加上约 2 万名犹太难民及其他欧洲犹太人,上海犹太总人数已达约 3 万人。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犹太人纷纷离境,至上海解放时只剩

《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第 12、38 页。

满铁小山猛夫:《东亚とユダヤ(犹太)问题》,中央公论社 1941 年版,第 128 页。此书有关青岛的记载很可能采自满铁所编《北支(天津、北京及び青岛)における犹太人の现势》,第 84-85 页。

国)得到了安排,生活安定。募捐有:难民救济金 1230 元,天津水灾救济金 1250 元,无息金融会有基金 1340 元,以便对需要者予以救济。社团月预算 310 元。欲致力于文化事业,但书籍缺少,故希望其他大社团予以寄赠。托瓦宾斯基时任青岛犹太人会副会长,会长是美籍犹太人 G E 蔡伯尔曼,他是位拥有百万不动产的老人,但实权在托瓦宾斯基手中。

这时青岛 221 名犹太人中无国籍的 173 人(主要为俄系),德国籍 24 人,英国籍 12 人,美国籍 7 人,其他 5 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开有舞池乐队,可以跳舞的饮食店较多,有 6 家,因为青岛为开放港口,有英美等国船上人员及来避暑的洋人和中国阔佬的生意,据说盈利较高。经营贷款业、开理发店、医院诊疗所、事务所的各 2 家,开西服店及乐器店各 1 家;其余独立生活的大多靠薪水。

五、上 海

199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培吉主编《上海犹太人》一书,对上海犹太人的情况有较全面的描述,西方这方面的论述则更多些,因此,笔者拟主要依据过去使用较少的日文资料作些补充。

1845 年,沙逊家族开始在上海经商,随着商业上的成功,形成了居住在上海的出自其羽翼下的几个犹太财阀家族及归于其工作系统的犹太人。他们多持英国籍,在文化及经济上已与上海的法租界及公共租界连为一体,属塞法迪犹太人,最多时有约 700 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上海俄系犹太社团人数达约 4000 人,加上约 2 万名犹太难民及其他欧洲犹太人,上海犹太总人数已达约 3 万人。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犹太人纷纷离境,至上海解放时只剩

《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第 12、38 页。

满铁小山猛夫:《东亚とユダヤ(犹太)问题》,中央公论社 1941 年版,第 128 页。此书有关青岛的记载很可能采自满铁所编《北支(天津、北京及び青岛)における犹太人の现势》,第 84-85 页。